

高层决策内幕全披露 国家战略玄机大破译

# 中国高层 经济卷 谋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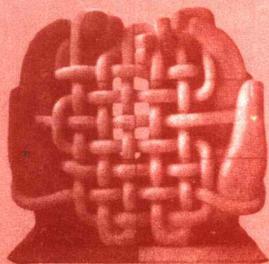
李云/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中国 高层谋略

李云 / 著

经济卷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 ZH1869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高层谋略. 经济卷/李云著. -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5

ISBN 7-5613-2194-5

I. 中… II. 李… III. ①发展战略-研究-中国②经济战略-研究-中国 IV.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9792 号

责任编辑: 周宏

## 中国高层谋略 经济卷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南郊吴家坟 邮政编码: 710062)

北京市黄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销

2001年6月第1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印张 字数: 230千字

定价: 48.00元(全二册)

本册定价: 24.00元

ISBN 7-5613-2194-5/F·53

---

开户行: 西安工行小寨分理处 帐号: 216-144610-44-815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问题, 请与发行科联系、调换

电话: (029)5251046(传真) 5233753 5307864



危机四伏的表面繁荣

第三代领导人沧海横流整治过“热”

· 高层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

背水一战推进五大改革

朱镕基说：中国“软着陆”可获诺贝尔奖

北戴河会议上的争议

游刃有余于改革、发展、稳定三角矛盾

刺激内需的思考

### 第3章 兼顾公平 以民为本

89

#### ——共同富裕谋略

务实性分配制度决策的艰难历程

我国现行分配制度运行格局分析

效率与公平矛盾的巧妙处理

高层关于当前我国各阶层收入分配状况的基本判断

朱镕基的三句话：“值得注意，尚不严重，正在解决。”

### 第4章 沿海内地 共同腾飞

114

#### ——区域发展谋略

邓小平力排众议建立经济特区的考虑

梯度推进式的区域发展战略

决策层浓墨重彩画浦东

“姓社姓资”的争论无情地波及特区

邓小平再度南巡

影响决策层的特区官学大辩论

中央表态的策略：特区要特，但要讲究如何特

深圳能否成为直辖市？

世纪之交的高层战略选择：向西部进军

## 下 篇 宏观制度谋略

### 第5章 改革症结 迎难而上

176

#### ——国企改革谋略

国企改革的步步为营：先外围，后核心  
让中央决策层辗转难眠的国企艰难处境  
高层分析国企问题的症结所在：体制束缚  
药方：抓大放小与产权改革  
国企为什么破产难？  
头号难题：下岗失业与国企改革的纠缠  
来自国务院的稽查特派员  
股份制与国企改革的深化  
破企业与破银行的艰难选择  
债转股：解困高招，还是骗人把戏？

### 第6章 经济核心 监管防危

222

#### ——金融业改革谋略

风起于青萍之末：中国的金融高风险让决策层忧心如焚  
挥向金融体制的四板斧  
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的背后“算盘”  
中国证券市场建立之初的高层决策  
刘鸿儒出山组建中国证监会  
史美伦出任证监会副主席所传达的高层信息  
入世对中国金融业的纷扰与对策

## 第7章 社稷之基 政策为上

265

### ——农村改革谋略

包产到户在争论中不断壮大  
解决路线之争的惟一办法是具有最高权威的人表态  
最初的农村改革遭多方反对  
在改革初期，城里人是跟着乡下人转的  
农村改革的两大谋略总结  
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大辩论  
五项改革的第一项——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策略  
农民负担与第三次重大改革——税费改革的出台

## 第8章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319

### ——对外开放谋略

中央决定建设对外开放的根据地  
渐进式对外开放战略的选择  
对外开放的态度和高层对策选择  
充分认识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对外开放  
中国高层加入WTO的战略考虑：

短期服从长期与局部服从整体  
改革是入世的基础，又是入的目的  
江泽民点评中美谈判说：有志者事竟成  
中美谈判的风云人物和谋略的得与失  
处理入世阵痛的妙方是早作准备  
高层决策外的不同声音  
入世尚未成功，国人仍须努力

## 参考书目

363

# 上 篇



宏观  
发展  
谋略

# 第1章

## 市场取向 渐进改革

### ——中国经济改革总体谋略

#### “第二次革命”

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建国以来历次经济体制调整显著不同的特征是，国家的决策者从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出发，全面地改变同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此，这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

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第二次革命”。

20年来我国经济改革过程曲折起伏，历尽艰辛。尽管在表现形式上复杂多变，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本质上观察问题，它的基本线索并不复杂，只在于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

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动因是，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将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变革不足以重振中国经济。

然而，正如一些中外学者已经注意到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中国经济，远没有人们想像的那样糟糕。大量的经济指标表明，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国的国民经济也没有达到崩溃的边缘。这一客观事实，迫使我们有必要全面把握1978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起点。

1976年9月9日，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毛泽东在为实现其理想耗尽了毕生精力后，溘然离去，举国上下沉浸在悲痛、困惑与茫然的复杂情感中；紧接着，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在不到1个月的短暂时间里，中国接连发生的这两个重大事件，既标志着毛泽东生前所发动的最后一次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结束，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历史开始了一个新的历程。

然而，我们所关心的是，在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背影下——从1976年10月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因素促使中央最高决策当局，从带领亿万中国人民继承毛泽东的遗志、“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急剧转变到客观、准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决定着手对多年来形成的经济体制进行彻底地变革。为此，我们不得不拉长历史的视线，审视我们所走过的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人即将掌握国家政权之际，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的缔造者们提出了“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由新民主主义社会演进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战略构想。这实际上是一种将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相结合的独特尝试——将实现国家工业比作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前提，在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下完成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这预示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将沿着以下的脉络展开，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向前推进。

客观地讲，1949年的中国，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首先，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经济起点很低，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仅有466亿元，人均国民收入仅为66.1元；第二，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有限的工业主要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几个大城市，按当时的标准看，现代工业只占10%，农业和手工业的比重高达90%，大约90%的人口分布在农村；第三，地缘政治环境险恶，除苏联有限的经济援助外，几乎没有外部的资金流入，西方国家实行全面对华封锁，甚至还要随时作好迎接战争的准备。

历史留给新中国缔造者们的决策空间非常狭小。在一组给定的国情条件约束下，要想在一个不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完成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就必须强化国家对总体经济资源的集中动员与计划组织能力。因此，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依托开始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成为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尽管我国以高昂的代价支撑了工业化的起步阶段，且由此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今后的经济运行产生深刻影响，但后来的发展表明，“一五”时期以“156工程”为中心的大规模工业建设，为我国建立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56年，我国提前实现原定要用15年以上时间完成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惟一的经济基础，于是建立了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这时，许多人对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认识是双重的：一方面，在集中计划体制全面建立以后，人们普遍感到计划经济的实际运转远不像理论上讲的那么好，问题不少，需要加以改革；另一方面，除了像著名经济学家和思想家顾准那样个别例外的情况，又几乎没有人敢于设想实行市场经济，让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去调节生产。

当时经济领导部门和经济学界改革思想的主流，是在由国家计划配置各种经济资源的大框架下容许市场力量起某些补充作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是陈云针对资本主义改造中出现的偏差（即追求清一色的所有制结构和无所不包的集中计划管理）而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又叫“三为主、三为辅”）的主张。所谓“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就是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以计划生产为主体，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为补充；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为补充。

在中国理论界第一个对行政性分权战略提出批评的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孙冶方。

他在1961年的一份送交当时财经领导人的内部研究报告中指出，财经体制的中心问题，不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条条”与“块块”的关系，也不是各级行政机构之间权力如何划分，而是“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它们同国家的关系问题，也即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问题”。他认为，只要解决了国有企业的独立自主的经营权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条条”与“块块”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孙冶方虽然对行政性分权提出了批评，但他并没有站在现代经济学的高度，从理论上讲清用这种办法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为什么是没有效率的。

更何况，当时思想禁锢是十分严重的，任何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偏离，都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所以不仅顾准很快被打成极右分子，他所提出的让市场价格的自发涨落调节生产这种现在看来十分精辟的意见随之湮没无闻，而且就连陈云这样功勋卓著、地位崇高的老革命家，他的意见只不过是占主体地位的计划经济旁边给市场发挥辅助作用留下一点余地，也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重提阶级斗争”以后，被当作“鼓吹‘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右倾思想”和“修正主义纲领”而遭到批判。

社会主义采取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自然更是一个严禁涉足的禁区了。

在1956年到1976年的20年中，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以毛泽东1956年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为基本指导方针。

他在这篇讲话中指出，传统的苏联体制的弊病，主要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从而损害了地方政府、生产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是中国经济在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后出现种种弊病的根源，必须加以改革。

毛泽东给改革指出的方向是：（1）在国家、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在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利润时要赋予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以便发展得更加生动活泼；（2）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上，“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

由于国内和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1958年实施的改革对以上方针作了一些修改：由于1957年中国国内的“反右派”运动，以及同时开始的对所谓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逐步升级的批判，

“企业自治”和“物质刺激”都被看作是“修正主义倾向”受到指责，从此在改革中不再被强调，而把重点放到了在各级行政机关之间划分权力和利益上，形成了在保持计划经济的总框架不变的前提下实行“行政性分权”的改革思路。在1958—1976年期间，行政性分权又有多次发动，但都未能取得成功，而且造成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循环，并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造成了国民经济濒临严峻形势的危局。

“文化大革命”的深重灾难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我国经济的发展道路问题。

作为毛泽东的继任者，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要治国安邦、富国强民，就必须完成第一代领导人的宿愿，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在即将进入新的历史关头的时刻，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如何起步，是按照毛泽东晚年的既定方针办，抓“纲”治国，带领中国步入现代化的建设？还是回复到“文革”前的经济管理体制，在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上推进国家的现代化？抑或还有第三条道路，开始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如何做出选择，对于继任者来说，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显然，华国锋由于自身的局限性，缺乏对中国前途的战略思考，执拗地选择了第一条道路。他的这种做法，招致了党内外社会各阶层的坚决反对和抵制。

1978年12月18—22日，在北京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全党工作着重点从1979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围绕这一主题，全会认为：

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陷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

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应该大力着手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

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业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

采取这些措施，才能充分发挥中央各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同时，全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来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她真实地代表了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一种长期压抑的、寻求变革的历史冲动，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标志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进入到伟大的历史转折——全面改革传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为中国步入现代化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变革的广阔空间。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和历史起点上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 体制外改革战略的实施

尽管中国的改革方式可以用一句通俗的话来概括：即“摸着石头过河”，但从经济体制环境的变化、尤其是从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角度看，其间的路径却异常清晰：基本上是采取自下而上、从外到内、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地将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与其说这是出于改革领导者的预先设计，不如更准确地说，是在变革过程中各个行为主体的利益驱动下的必然选择。改革领导者的作用旨在于，适时地做出了符合客观发展趋势的正确决策。

一般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初始阶段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十二届三中全会前的1983年结束。这个阶段改革的总体特征是从旧体制的薄弱环节入手，培育新体制的生长点。

在改革的初始阶段，面对盘根错节的集中计划体制，以何处作为改革的突破口，确实是困扰改革决策者的重大难题。然而，任何一种封闭、僵化的经济体制，在其固化了一部分群体的既得利益的同时，也必然造就了受到剥夺的另一部分利益群体。

这个难题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的企业改革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正如中国经济学界的宿将、解放后又长期担任中央政府经济领导工作的薛暮桥所说，中国经济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

二：“一是企业（包括集体经济单位）管理制度的改革，使企业成为有活力的基层经营管理单位；另一个是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使它更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

不过在当时，人们注意的重点显然在第一个方面，特别是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因此，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经济改革，是从国有企业开始的。

这一改革的基本思路同1958年的“行政性分权”方针相比较，就它们都提出要“放权让利”这一点来说，彼此是十分类似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次改革的重点，从向各级地方政府分权，转到了扩大国有企业的自主权上。

在拨乱反正在的过程中，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领导人从过去的曲折中吸取了教训，普遍认同孙冶方的应当把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和提高企业竞争力放在改革中心地位的观点。以国有企业为重点的微观改革的最著名的倡导者还有蒋一苇和董辅弼。

蒋一苇认为，中央集权模式是一种“国家本位论”，行政性分权是一种“地方本位论”，二者都是不足取的。改革的模式应当是“以企业（包括工业企业、商业企业、农业企业等等）作为基本的经济单位。企业在国家统一领导和监督下，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一方面享受应有的权利，一方面确保完成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他主张：“企业应当是企业全体职工的联合体，……企业的权利是掌握在全体职工的手里”，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

董辅弼则主张改变“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认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单位“应该具有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实行全面的独立的严格的经济核算”。“各经济组织中的劳动者有权在维护和增进全体劳动者的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在统一计划的指导下，